

热评

《你好，李焕英》：家庭相册还是拼盘小品

龚艳

《你好，李焕英》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电影，然而在剧中，人物并非是高简单纯粹就越好。对照《你好，李焕英》小品原作来看，电影版本在人物表现上显然“降维”了。

电影比原作更封闭和刻板地塑造了母亲——她似乎没有爱过父亲之外的别人，是那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为女儿和家庭存在的“母亲”而非“李焕英”，回到过去也只是为女儿扮演了一个年轻的自己，并成为女儿的母亲。电影的英文名是“HI, MOM”，而中文名则是“你好，李焕英”。可见，导演曾试图呈现的是那个没有妻子、母亲身份的女性，而整个剧作最大的矛盾恰恰在此，它的最终呈现更趋向于英文名，女儿只是和母亲一起做了一次“梦旅人”。

影片将“让母亲快乐”浅白地解释为最世俗的成功学：回到过去的自己只希望母亲能嫁得更好，能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直到最后一场开着敞篷车载着母亲的自己，还在传达一种关于幸福的“成功学”。“子欲养而亲不待”当然可以激起对亲情的感动，然而影片中又表达了平凡的自己将无颜面对母亲这一议题。与此对照的是歌颂母爱无怨的付出，即使一个平凡的女儿也是母亲的珍宝，母亲也因“母性”而扁平化。这种对母性的刻板复述和幸福成功学的关联，使得这部影片触及到儒家伦理，孝道文化中植根最深的部分，也正是影片可能引起观众民族情绪“共振”的主要原因吧。

不可否认，伦理电影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类型，从1930年代的《天伦》《人道》，到1940年代蔡楚生、1980年代谢晋都从不同角度讨论儒家伦理下的“家”及父子关系。母女关系不同于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是君臣、家国关系的另一种投射，而母女关系除了对母性奉献的颂扬还应该具有更微妙和复杂的女性话题。那些对母女关系有深入讨论的电影却票房失色，比如《春潮》《柔情史》《血观音》，甚至父女关系的《饮食男女》。这些影片都将亲情的复杂性裹挟在传统伦理中，同时又将其拆解为女性之间的对抗与温情。如果仅仅将母女放置在母性和伦理范畴，它本身已经丢掉女性这一议题，难免过于单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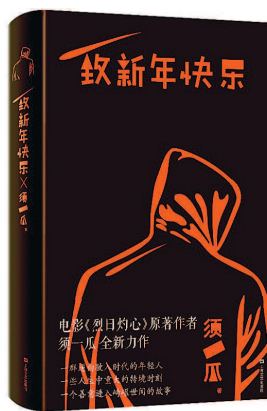
你好，李焕英 HI, MOM

本片作为穿越剧，试图还原时代感，但我更愿意将这种还原视为“个人回忆”或“家庭相册”，影片中将年代感元素拼贴：古惑仔、粤语歌、电视机、女排以及深圳开发区等等具有1980年代标志性的议题，但这些都仅仅作为符号浮在了影像的表层，而不是成为故事的肌理，融入线索之中。对“三线建设”的复原也远不如《青红》《闯入者》来得细腻。影片的时代感正如黑白胶卷的“人工”上色，绝非“现实”。它是一部关于贾玲自己的个人疗愈影像，是贾玲对母亲时代的想象：洋溢着集体主义的温暖，积极向上、欣欣向荣，这种处理无疑是粗糙的，也缺乏层次和质感。个人经历、境遇、空间的差异往往形成家庭相册类电影的异质性，比如《四个春天》里的贵州县城的父母，

《小伟》里的广州的癌症父亲，浙江祖屋等，这些影片的真实感基于“细节”，所谓真情实感是通过细致入微地对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营造来完成的，共振藏在“细节”里，而不是对时代囫圇吞枣的简笔画。类型而言，这部影片甚至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喜剧电影，它在剧作上更像是一个小品集，小品的核心是语言与特定环境下的即刻冲突。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事件的拼盘式组合：办升学宴、买电视、打排球、文艺汇演等，而不是一个充盈的电影叙事结构，笑点主要集中在语言和肢体。当然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喜剧的内核是悲剧”的故事，因为观影过程让我们热泪盈眶，但片中所呈现的是“悲情”“苦情”而非悲剧性。剧中人物群像也是相对扁平和平静的：如厂长，厂长儿子以及母亲的对

手王琴。简言之，影片更近似一个家庭相册或者小品拼盘，但这并未影响到这部影片继续走向预售票房50亿元以及豆瓣8分以上的评分。有调研显示：2021年春节档最受喜爱的类型是喜剧，无论是穿越的还是推理，评分都较好，其中《你好，李焕英》排名最高，这无疑留下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给电影研究者和创作者：电影的商业成功是否等于这样的电影形态是应该提倡和推崇的？以及它的成功是否有一些更深层的民族审美心理在其中？如果有，作为创作者应如何将之变成电影制作的优质源泉，电影的产业如何走向更良性的发展？《你好，李焕英》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电影，它似乎也将书写女性导演的票房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下一位、更多位的女导演。（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影评人）

创作谈



作家须一瓜新作《致新年快乐》

像恋爱一样生活，像恋爱一样书写

谈谈我的最新长篇小说《致新年快乐》 须一瓜

《致新年快乐》这小说是笔老账，早就写但一直没写，我甚至想过我可能不会写了，但有一天，我突然开始，一口气猛写，其中两次，情难自禁。我想是音乐的醇化作用吧，但我也由此确定了：那面天真的、逆动的、美丽的小旗帜，依然插在我的世界深处。也是风一样的猎猎梦想，试图破译不切实际的秘密人生。

梦想本身，门槛很低，白天晚上，是人都可以梦，但践行梦想，把梦想落地为现实，门槛很高，可以高到人间烟火以上。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无人目击的梦里人生。它大多不切实际，越不切实际，越梦得壮丽。尽管光天化日下，人们的现实与理性，在稳重地闪避、沉默。但在我们的年轻或我们的酒后，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各种迷梦在庄重流转——极地探险者、星盘高人、架子鼓手、神探；透视而睥睨人间的历史学家；奇门遁甲、纵横天涯的海盗、阿肯那顿法老……梦想里的我们，佛光在背，黑发如帜；那是没有何阻滞、过滤掉所有困苦艰难的快意人生。

但更多的普通梦想，这可能是比较容易显影出来的种类，比如小小警察梦就时不时见诸报端。它光滑又脆弱。据说有个年轻人，痴迷警梦无法自拔，自备头盔，夜夜不休，到网吧巡查劝退未成年人；又据说有三青年，在某贸易会期间，着假警服排队起行街头执法维护秩序。路遇同行，立正敬礼致敬。因为多礼，反而被真警识破。不切实际的细节，碾碎了他们的梦想；此外，几乎每座城市，都能看到脱胎于警察梦的民间反抗志愿力量，红红火火。

我采访过几个反扒警察，他们属于刑警的一个序列，主要战场就是公共交通以及公共场合，主要对手就是小偷扒手。在手机支付畅行前，警察和小偷每天疲于奔命，在城里进行猫和老鼠无休止的战斗。因为经常过招，彼此太熟了，在案件以外，老鼠看起来非常尊敬猫。即使这样，猫也没有好脸色；而再致敬警察，老鼠也从未放弃扒窃，猫和老鼠都矢志不移。

力量悬殊，反扒刑警就聊到了反扒志愿者。志愿者让警察很感动，他们想不到有那么多的热血公民——那么多为天下太平而战的男女老少，他们各怀其技各呈其勇地要干反扒。甚至春节加班什么的，正规军吧，一年忙到头，就是给加班费，人家也还是渴望回家团圆，志愿者呢——不要钱，分文不取，还非得严肃游说，就怕你不排他的班。一来二往渐渐地，警察明白了，很多人，就是来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不仅仅是盯防一个小偷，扭送一个扒手那么简单，他们痴迷的，就是改变人生的本来设定，最大化地实现自己对扶正祛邪、公平正义的影响力，是隐秘人生或者说，英雄人生的曲折兑现。只要能够实现精神满足，赈品就是真品。

梦想，往往是无处安放的精神宝石，要找到匹配梦想的项托，戒指托并不容易。可是，我们知道，人就是这样的做梦动物。

一旦和生活某点对上了，他总会寻找、总会不自量力地追求更高、更光辉的人生设计。那里，可能激发更深的思想，更大的胆量，可能是更多的仁爱、可能是勇敢与牺牲……当然——不可否认——也可能是，把梦中的为公理想，变成可以吹吹私囊的花心；总之，只要给我们一个梦想托子，我们就有契合的意愿，在上面放上一个心仪的宝石，把自命的人生意义彰显放大。所谓“最早贱者，也有力量遵循一个并非他选择的圣神模范，塑造一个伟大的道德人格，使他自身和理想等同。只有在生活的深处，这个伟大的道德人格才能被雕刻出来”（莫里斯·梅特林克）。

新年快乐，就是一个梦想托子，它托住了二十年前一个逆动的、天真的、美丽的“宝石”。就像一颗流星，它无人纪念地划过多年前的天空。在眼下世风，我替这“宝石”害羞。聪明的我们，已经不好意思谈论一些不合时宜的辞藻了，辨识生活中内在的精神的优雅，已经是令人难堪的事。好东西，尚未成熟已沦为没有经济价值的古董老物件。在人们把力气用在争抢铜板、擦亮银器的时代，很多用不上的念头，都开始生锈、发霉，何况一块天真的自认宝石。它可能就是一块抛光灼灼的玻璃罢了——谁来擦拭宝莹？

而这个天真的、逆动的、美丽的、愚蠢的小孩子，就一直插在我的心里。我走不开。我像恋爱一样关注，像恋爱一样书写，书写那些把人生当恋爱一样过的人们。整个小说，好几个地方都是放着相关音乐写作的，准确说，是听到情绪饱满开写，然后再再写。

我知道在文字里，我不能把写作中我感受到的连叶带汁地传达给读者，但还想尽力去做。边不亮离去的时候，这个雌雄莫辨的无厘头少年，骑着摩托在瓦格纳《女武神的骑行》的音乐中，绕行远去。这是散伙的告别，激情满怀的出征旋律，只是映衬了壮志不张的无奈；最后，新年快乐人去楼空，成吉思汗孤独地坐在已经转让的厂办公室，最后的音响室播放的是《沃尔塔瓦河》……这才是最后的梦境的告别，和那些用梦的砖瓦建造的世界，和那些用热望与心血铸就的世界告别。深情、坚韧、辽阔，爱而不能，矢志不移。在成吉思汗下落不明的卷尾，他的家人在他的房间，再次听到了《沃尔塔瓦河》。这个爱而深情的旋律，大潮般地冲击着成功的实利人生。家人明白，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那个世界的高贵与美。

我不知道，这段不谙世事的荒唐走板，这份懵懂荒唐的济世激情，于我，究竟在散发什么样的极光魔力呢。（作者为知名作家，其长篇小说《太阳黑子》曾改编为电影《烈日灼心》）

“英伦电影大师展”即将开幕，参展影片中曾名列“英国影史百佳”榜首的《第三人》尤其引人注目

一部“好莱坞不可能翻拍”的经典是怎样诞生的

■本报记者 柳青

春节档后，上海首个专题展“英伦电影大师展”来了，本周五开票的排期表堪称一次“神仙打架”的名作集合。改编自同名歌剧的彩色歌舞片《曲线梦回》，改编自作家福斯特小说代表作《霍华德庄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品特编剧的《仆人和幽情密使》，在学术界掀起“电影心理分析”潮流的惊悚片《偷窥狂》，以爱尔兰独立战争为背景的《风吹麦浪》，以及一度名列“英国影史百佳”榜首的《第三人》等……选片阵容炫目且庞杂，每一部作品在特定的类型片领域里拥有难以逾越的地位，每一部作品都曾创造过潮流、甚至仍影响着当下同类型电影的创作。

其中《第三人》的地位格外特殊，这部电影是英国作家、英国导演、英国电影班底和好莱坞资本合作的结果。然而在它上映近半个世纪后，美国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每次好莱坞传出要翻拍《第三人》的消息，我会感到胆战心惊，因为它是好莱坞永远无法复制的一部经典。”

作家电影的灵魂

今日的维也纳保留着旧欧洲的皇城气派，仿佛豁免于岁月的一座主题乐园。其实在战后的头几年里，它和柏林、罗马没有区别，到处断壁残垣，物资极度匮乏，含辛茹苦的普通人无所不用其极地试图从黑市交易中获取必要的食物和药品。1948年春寒料峭的季节，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接受制片人和导演卡罗·里德委约来到维也纳，这座哈布斯堡王朝的大都会变成了废墟之城，格林目睹所见处处是人心与街市同等破败的荒凉凄惨景象。

“我初来维也纳，竟是在看着哈里的灵柩落葬于冻土下……”格林信手在一张信封背面写下开头，后来成了影片开场时男主角霍利·马丁斯的旁白。这句带着悬念色彩的陈述，引伸出一个友情和爱情在罪与罚的环境中覆灭的黑暗童话，傻白甜的美国蹩脚作家到欧洲投奔童年好友，却在揭开层层迷雾后发现，对方伪造了自己的死亡并沦落在黑市不择手段的恶棍。

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段台词是扮演哈里·莱姆的奥逊·威尔斯即兴发挥的：“意大利在博尔奇亚家族治下30年，战乱不断，但他们拥有达·芬奇和文艺复兴；瑞士人安享500年太平岁月，他们发明了什么？布谷鸟钟。”但长久以来，一种默契的共识认为，虽有导演里德高度风格化的视听呈现和威尔斯独一无二表演，但电影《第三人》的灵魂是作家格林塑造的。



▲“英伦电影大师展”海报。 ▲电影《第三人》剧照。

现实破败，影像的修辞却何其优雅，这是电影里最终极的浪漫

有意思的是，格林每每被问起他最得意的编剧作品时，他从不提《第三人》。这很可能是因为导演里德颠覆性地更改了格林在剧本中写作的结局。格林最初给这个悲凉的故事安排了戏剧化的团圆，霍利和哈里的旧情人安娜在墓园相拥。里德认为，安娜纵然被哈里辜负、被抛弃，但她不会在哈里死后选择霍利，因为霍利协助警察追捕哈里，他选择公义时，背叛了友谊。背叛者无法得到圆满的结局，无论他背叛的初衷是什么。“公主和王子宫女缔结良缘，因为公主绝望地爱着一个不可饶恕的恶棍。”所以她漠然地从良人身边走过，孤独地走向地平线的尽头——这个镜头很长，长到男演员科顿当时以为拍摄结束了，只是导演忘了喊停，他没想到摄影机一直在转。这是一个完全出自导演意志的、非常挑战常规观影习惯的超长镜头。

这个又丧又长的镜头，谁有耐心看完？没想到这段画面成了被津津乐道的神来之笔。岁月流逝，《第三人》位列神坛，越来越重的解读让它日渐渐地脱离它的作者而成为独立的存在。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里德和格林相继辞世，罗杰·伊伯特说，他们这辈影评人在《第三人》中男女情爱的哀歌中看到美国和欧洲的隐喻。“写拙劣冒险小说的霍利是美国的缩影，鲁莽、没有受过伤害，和某种程度的愚蠢；带着不可言说的战时记忆和创伤的安娜，是沉痾深重的战后欧洲，她无法也不屑于对霍利讲述自己已经历过的炼狱。满坑满谷的好莱坞电影就像霍利写的廉价小说，盲目地相信着美好的未来。好莱坞没有能力复制《第三人》，就像霍利永远不懂安娜从没说出口的爱与黑暗的往事。”

这是好莱坞无法企及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年迈的伊伯特用挽歌式的口吻写道：“我在巴黎一个阴沉的雨夜第一次看到《第三人》，它立刻让我懂得了电影真正的浪漫是什么——现实破败，情感千疮百孔，但影像呈现这一切时，修辞何其优雅。”